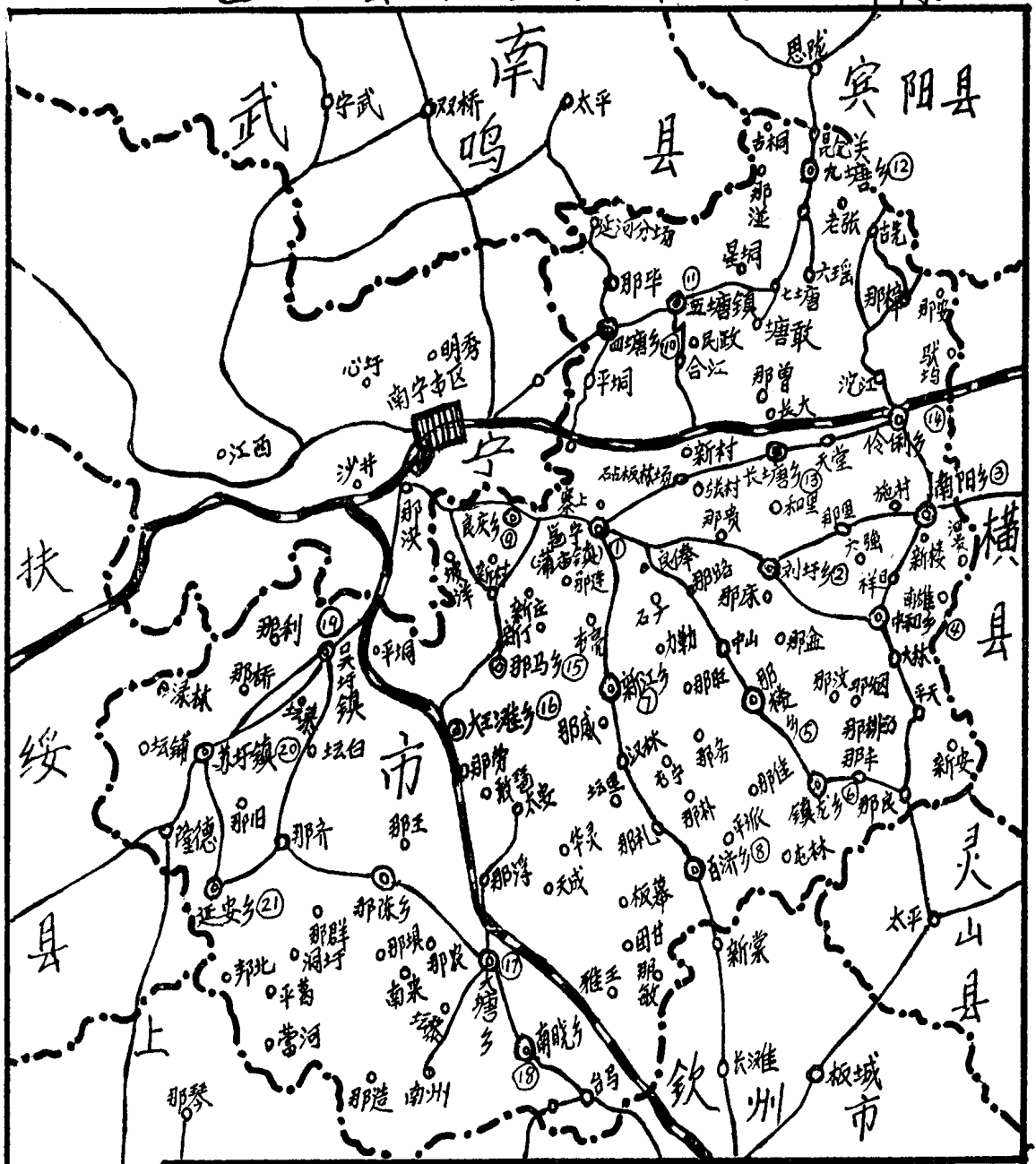


000781

邕宁教育志

《邕宁教育志》编写组编著

邕宁县学校分布图 (1993年制)



- ①邕宁高中、蒲庙中学、蒲庙二中、蒲庙三中、城关中学、民族中学、邕宁教师进修学校、邕宁职业高中、朝阳中学、龙岗中学、城关1、2、3、4小学、新安小学。②刘圩中学、刘圩乡中、刘圩中心小学。③南阳中学、南阳乡中、南阳乡中心小学。④中和中学、中和乡中、中和中心小学。⑤那楼中学、那楼乡中、那楼乡中心小学。⑥镇龙乡中学、镇龙乡中心小学。⑦新江中学、新江乡中、新江乡中心小学。⑧百济中学、百济乡中、百济乡中心小学。⑨良庆中学、良庆乡中、良庆乡中心小学。⑩四塘乡中、四塘乡中心小学。⑪五塘中学、五塘镇1、2、3、4中、五塘中心小学。⑫九塘中学、九塘乡中、九塘乡中心小学。⑬长塘乡中、长塘乡中心小学。⑭伶俐中学、伶俐乡中、伶俐中心小学。⑮那马中学、那马乡中、那马乡中心小学。⑯大王滩乡中、大王滩中心小学。⑰大塘中学、大塘乡中、大塘中心小学。⑱南晓中学、南晓乡中、南晓中心小学。⑲明阳中学、吴圩镇1、2中、吴圩镇中心小学。⑳苏圩中学、苏圩镇中、苏圩镇中心小学。㉑延安乡中、延安乡中心小学。

序(一)

《邕宁教育志》编写组

国将兴，必尊师而重教。编修教育专志，是尊师重教的一个具体体现。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教育局的具体指导下，五经寒暑，数易其稿，编撰了邕宁县教育专志，旨在总结我县教育的历史经验，弘扬民族文化教育，增强“尊师重教”意识，推动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从晚清年代起，一直延续到1990年（少数内容延续到1993年），按照志书体例要求，横排竖写，据实直书；除大事记、总述和人物部分外，分述部分共分为十三章六十二节，体现了系统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反映了我县教育的民族特点、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成为我县历史教育的一部乡土教材。

我县自晋代建制以来，迄今已逾1600余年。其间，教育事业随着时代的嬗变而发展。全县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作为促进社会文明建设的教育事业，我县却从未有人能够系统地为其作志，致使一些有价值的教育史实被湮没于历史长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已逐渐认识了编修教育志的重要意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重视了这一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把修志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能受命于兴志之时，负起编写县教育志的重任，深感荣幸！但编写教育志这一工作，前无古人，缺乏经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本志的编撰虽几经寒暑，但因各方面的条件限制，总的来说，还是很粗糙的。要想使本志书成为一部较完善的志书，恐怕尚有待于后人的继续努力。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为了修好志书，我们曾用了将近四年时间专门搜集资料，先后到区通史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以及邕宁县志办公室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同时还参阅我县部分乡（镇）教育志和部分中学的校史，并进行了个别采访。广泛的资料来源，大大地丰富了志书的内容，使志书能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近百年来我县教育发展的全貌，反映了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为当前我县教育的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起到了“资治、教化、存史”作用。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应该重视历史研究。古往今来，重史而兴业的例子成千成万。毛主席生前曾反复劝导中国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研究。我们想，倘若《邕宁教育志》在诸君研究邕宁县教育历史的工作中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将是对我们编写邕宁县教育志的最大奖赏。

《邕宁教育志》是在全国各地编写方志的潮流推动下问世的。限于编写水平，更兼资料不足，仓促付梓，错漏在所难免，恳望同仁批评指正！



序 (二)

邕宁县教育局局长 李克林

《邕宁教育志》终于能够出版问世了。这是我县教育界的一件喜事。我因为能够为之作序而深感荣幸！

我国学校教育滥觞于4000多年前的夏代。学校，夏代称“校”，殷（商）代称“序”，周代称“庠”。《孟子·滕文公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所谓“校者，教也”，就是说“校”是驯马和骑马御之处；所谓“序者，射也”，就是说“序”是习射之所；所谓“庠者，养也”，就是说“庠”是养老之所，有地位、有专长的“国老”“庶老”被供养于“序”而担任教师。至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这样的大教育家和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是我国封建时代的“至圣先师”。至秦汉时期，官学复兴，创立了察举取士制度，出现了董仲舒、王充这样的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至魏晋南北朝，九品正制度产生，官学时兴时废，私学应运而兴，在此期间出现了颜之推这样的著名教育家。至隋唐时代，官学兴盛，科举制度创立，出现了王通、孔颖达、韩愈、柳宗元这样的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至宋元时期，书院产生并趋兴盛，科举取士先滥后严，这期间出现了张载、朱熹、许衡这样的著名教育家。至明清时代，书院官学化，确立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迨至清朝之末，废除科举，新式学校产生和新学制确立，在此期间出现了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迨至民国时期，新学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蔡元培、杨贤江、黄炎培、陶行知这样一批有影响的大教育家。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教育历史最崭新的一页，迎来了中国教育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涌现出了如徐特立、吴玉章等一批灿若群星的大教育家。毛泽东、邓小平为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是指导新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于我国源远流长的教育发展历史，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客观的记录。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才编修了这部《邕宁教育志》。

《邕宁教育志》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我县教育的昨天和今天，而且还能让我们从其所记述的史实中一斑窥豹，预测未来，激励和鼓舞我们更好地办好我县的教育事业。

《邕宁教育志》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和县教育局的具体指导下编纂而成的。参加志书编纂的同志呕心沥血，历时五载，几易其稿，终于编成了本志。我认为本志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较好地反映了我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堪称称为我县的第一部教育志书，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毋庸讳言，本志尚未能做到十全十美。由于它的编修前无古人，工程浩大，资料匮乏，加之仓卒编印，因此，讹误、纰漏在所难免，恳望识者不吝赐教，为日后编纂更完备的志书作出贡献。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使用史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使志书能充分反映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邕宁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二、本书采用志、记、传、图、表、录的体裁进行编写，由大事记、总述、分述、人物、附录五个部分组成。“分述”部分共列十三章六十二节。采取以志为主，分门别类，以章统节，以节统目的方法进行记述。

三、本志系属新修，一般从晚清写起，但有些章节，为了方便系统记述，还要上溯得远一些，一般下限至1990年底。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为原则。

四、本志“事以类聚”、“横排竖写”，力求做到横不漏项，竖不断线。对“文化大革命”则粗写、略写。“分述”部分，一般按事物的始末过程编写，将编者的观点寓于叙事之中。

五、本志对历史纪年、人名、地名、单位名称、各级政府、官职等均用当时当地的称谓，必要时用括号加以注明。人物称谓，除特殊情况者外，一律直书姓名或职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般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使用文字，除人名、地名等之特殊生僻字照录外，一律采用国家公布之简化汉字。数字及公元纪年，一律采用阿拉伯字。

七、《人物》章的编写原则：①不涉及历史名人；②只记其有关献身教育的事略，不为立传；③以记述本县籍先进人物事迹为主，在我县从教的外籍人员，视其具体情况，亦可适当编入；④不为生人立传。

八、“附录”部分，旨在辑录那些有参考价值而又不适合编入正文各章节的史籍及有关资料。

九、本志所用资料，或为旧志所载，或为史料所记，或为各乡（镇）、中学教育志所记述，或为采访所得。虽经筛选，但仍力求保留其资料的原貌。凡引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邕宁县历史上建制多变，特别是解放以来，县的版图曾有多次大的变动。为了便于记述起见，文内各年代的所有数字，仍旧保留原样，不加注释、删减。

邕宁教育志编目

总述	(1)
大事记	(12)
第一章 教育行政	(66)
第一节 机构设置	(66)
第二节 组织职能	(67)
第三节 管理体制	(68)
第二章 学宫 私塾 书院(含社学、义学)	(73)
第一节 学宫	(73)
第二节 私塾	(75)
第三节 书院 社学(义学)	(80)
第三章 科举制度	(86)
第一节 试院设置	(86)
第二节 文举考试	(86)
第三节 武举考试	(87)
第四节 五贡	(88)
第四章 幼儿教育	(147)
第一节 幼儿园设置	(147)
第二节 保教工作	(147)
第三节 保教队伍	(148)
第四节 经费来源	(149)
第五章 小学教育	(155)
第一节 学校设置	(155)
第二节 教学工作	(158)
第三节 思想品德教育	(163)
第四节 体育卫生	(167)
第五节 学校管理	(169)
第六章 中学教育	(185)
第一节 中学设置	(185)
第二节 教学工作	(189)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	(215)
第四节 体育卫生	(219)

第五节	劳动技术教育	(226)
第六节	课外活动	(227)
第七节	学校管理	(228)
第七章	职业教育	(247)
第一节	农业中学	(247)
第二节	职业中学	(249)
第三节	师范学校	(250)
第四节	县教师进修学校	(255)
第五节	中共邕宁县委党校	(256)
第六节	蚕业学校	(257)
第七节	商业学校	(257)
第八节	卫生学校	(257)
第九节	农业技术耕读学校	(257)
第十节	农业技术学校	(258)
第十一节	“五·七”劳动学校	(258)
第十二节	农机校	(258)
第十三节	“五·七”劳动大学	(259)
第八章	成人教育	(264)
第一节	扫盲教育	(264)
第二节	文化夜校	(272)
第三节	业余中小学	(273)
第四节	业余师范	(274)
第五节	业余中专	(274)
第六节	函授教育	(275)
第七节	广播电视大学	(275)
第八节	自学考试	(276)
第九章	壮文教育	(277)
第一节	机构设置	(277)
第二节	壮校	(277)
第三节	培训	(278)
第四节	试点班	(279)
第五节	经费	(280)
第十章	师资队伍	(282)
第一节	配备、任用	(282)
第二节	考核、培训	(286)
第三节	师资待遇	(290)
第十一章	教学研究	(301)
第一节	机构设置	(301)
第二节	教学研究	(301)
第十二章	教育经费	(304)

第一节	经费来源	(304)
第二节	经费使用	(308)
第三节	勤工俭学	(310)
第十三章	教学设备	(313)
第一节	校舍建设	(313)
第二节	仪器设备	(321)
第十四章	教育人物	(334)
第一节、	人物传略	(334)
	(一) 雷沛鸿	(334)
	(二) 纽佩瑞	(334)
第二节、	留名录: (1983年至1986年获全国英模称号的教师名单)	(334)
附录:		(335)
	一、《邕宁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写组成员名单		
	二、解放以来邕宁县中、小学(念师范、职高及乡、镇教育组)历任校级领导名录		

总 述

邕宁全县土地面积4725平方公里（折合708.8万亩），耕地面积114万多亩。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共有居民169254户、829651人，有壮、汉、苗、侗、瑶等22个民族，（其中壮族75729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1.28%；汉族70471人，占全县人口的8.49%；其他民族1889人，占全县人口的0.23%）。在全县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940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有4756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69940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423662人；文盲、半文盲（15岁以上）的有62739人。全县有二十一个乡（镇），其中十个属山区，十一个属丘陵。全部县境均处于北回归线以南，自然条件优越，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

解放前，邕宁县治所一直设于南宁（详见附件：《南宁设市简况》）。南宁县城系广西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在县城发达文化的影响下，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相应发展。据旧《邕宁县志》记载，清末时，县城仍办有学宫三处（含文庙一处），城乡亦办有书院二十处（九处在南宁、十一处在乡村）、社学八处（六处在南宁、二处在乡村）。此外，大多数村坡还办有蒙馆（私塾）。（详见附表一）

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教育体系，邕宁教育面貌亦随之有了改观。在初等教育方面，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邕宁县先后成立了初、高等小学堂共21所，其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的有6所（高等4所、初等2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三年（1911）成立的有15所（高等7所、初等7所、初等女小1所）。其间，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了县立南宁模范小学堂，这是邕宁历史上首次创办的重点小学堂。在中等教育方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南宁师范学堂（后改为省立第三师范学堂）成立，邕宁县学务所附设于学堂内〔注：该校系将左江、蔚南两书院改建而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竣工，但因筹措办学经费问题，延至宣统元年（1909）三月才开学上课。共用建筑费银32000余两，开办费3674.15元〕。南宁师范学堂的创立是邕宁县近代中等教育的开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将乌龙寺等庙宇改建，成立南宁府中学堂，学制四年，一年分为三个学期。附设升中学预备班，期限一年。堂长（学监）由知府兼任。至清宣统二年（1910），成立县立蚕业学校，校址在今之南宁葛麻岭中医院附近。同期成立的还有县立商业学校，校址在今之南宁市一中校内。

然而，必须指出，清末，邕宁县贯彻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废除科举制，建立新的学校制度，改办了学堂，但当时各级学堂仍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学方针，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作为培养目标，因而，这种封建主义教育改革，实质上是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体制过渡的一种形式。

(二)

废除帝制，建立民国。尔后，学堂改为学校，各级教育有所发展。民国元年（1912）至十二年（1923），邕宁城乡共新成立小学231所（高等34所、高等女小1所；初等190所、初等女小6所）；成立县立中学一所（注：其前身系县立商业学校，于民国七年改为县中。至民国廿三年学校停办。学校所有设备、师生均并入省立南宁初中）。但其时仍有私塾65处，学生1000多人。

新桂系统治广西期间，邕宁教育曾进行了两次改革。首先，从民国十三年（1924）起，城乡各小学陆续改行新学制，高等改为高级，学生修业三年改为两年；初等改为初级，修业依旧四年。至民国廿二年（1933），由旧学制的高等小学堂47所，发展到高级小学56所；国民初等小学堂206所，增加到国民初级小学475所（详见附表二）。民国廿一年（1932）七月，全县举行首届高小毕业生会考，核准应行毕业会考774人，实参加会考的547人。考试结果，获得毕业资格的94人，占会考总数的17%强。可见当时教学质量之一斑。其次，从民国廿二年（1933）九月起，在雷沛鸿的积极倡导下，邕宁首先推行了国民基础教育制度，陆续将城乡高级小学改为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将各村街的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基础学校。到民国廿四年（1935），由原有高级小学56所，增加到中心国民基础学校86所，学制仍为两年；由国民初级小学531所，调整为国民基础学校398所，学制仍为四年；在校学生5900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70%左右。

民国廿五年（1936），县创立表证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并附设幼儿园，址在今之南宁中山路“北段小学”内。这是邕宁历史上创办的第二所重点小学（第一所是1906年创办的县立南宁模范小学堂）。

解放前夕（1949），全县有44.6万多人口（含南宁市人口），农村仍办有小学672所，在校学生30657人。此时学校设备十分简陋，很多学校用宗祠、庙宇作校舍。学校布局设点也很不合理，许多自然村坡都没设教点，如伶俐乡上王村，全村一百多人口，却没有一间学校。居住分散的山区，小学生上学更困难，如那陈乡七齐坡小学生上学要走40里山路。所以，这时候山区儿童的入学率很低，多数儿童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

此外，在南宁市区，还创办有总工会工读小学一所、幼儿园两所、育婴堂一所，专门培育职工子女。乡村幼儿教育尚未起步。

中等教育方面：民国十三年（1924），县立蚕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时有教员15人，每届招收学员55人。职业学校于民国廿二年停办。民国二十年（1931）全县有中等学校三所（详见附表二）。民国廿二年（1933），县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一所，校址在今之南宁亭子街平南白沙村。时有教员6人，一班学员50人。本届学员修业期（一年）满后，学校即改为县立国民中学。后来，该校迁址至今之南宁市一中（云廷街）继续办校，规模不断扩大，至1950年初，又易名为南宁市一中，属市管辖。民国廿四年（1935）八月，原区立三官、迁龙中学改为县立中学。至解放前夕（1949），仍有公立中学六所，乡村私立中学两所（班峰、南荣中学），在学校学生2546人。

此外，民国时期，南宁市区还先后创办了省立中学、师范共5所，省立职业学校5所，私立中学12所。教会学校和其他学校共10所，总计32所。上述学校虽不属邕宁管辖，但邕宁县籍子弟均可习业其中，故对培养邕宁人才大有裨益。

成人教育方面：据史料记载，三十年代初，邕宁成人教育才开始普遍施行。民国廿一年（1932），全县共成立民众学校（夜校）69处，分期分批组织广大群众参加识字班学习。直至民国廿八年（1939）上半年，各地仍继续举办民众学校，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事业。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的形势需要，民众学校把识字教学和宣传抗日紧密地结合起来。民国廿八年（1939）下半年，日军犯邕，全县沦陷，民众学校被迫解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内战，成人教育运动亦随之泯灭。

民国时期，邕宁教育仍摆脱不了其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制度的窠臼。如此时在南宁创办的教会学校，乃是帝国主义列强实行文化侵略、进行奴化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其目的是培养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忠实奴才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所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名义上是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宗旨，实质上是为巩固和维护桂系的统治服务。兴办成人教育事业，也同样被纳入了他们办学目的的轨道。

（三）

新中国成立后，邕宁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贫困愚昧作斗争，努力发展教育事业，逐步改变了教育的落后面貌。

1950至1956年，主要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这七年，党领导各族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旧教育体系也在这一转变中得到根本的改造。

1950年初，县人民政府接管旧有的公、私立中小学。由于当时蒲庙、新江等地仍有匪乱，故至年底，部分中小学的教学秩序依然混乱。

1951年，经过清匪反霸后，广大农村陆续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社会趋于安定。教育实行向工农开门方针，邕宁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年底，全县办有682所小学，在校学生50920人，教职员1680人；亦有3所中学，在校生672人，教职员43人。成人教育也开始施行。

1952年后，经过土改复查、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觉悟，使教师初步划清了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界限，逐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学校开设政治课，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五爱”教育，学生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进行中小学调整工作后，全县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到54年底，三所中学的在校生已增到1606人，教职员126人；完全小学发展到65所，村小增到862所，在校生共74300人，教职员2418人。民办小学教育事业开始起步。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此时，全县教师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的过程中已取得了一定成果，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本质、阶级性以及教育的任务和要求。各级学校建立和健全教学研究组织、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小学又有新的发展，小学增到996所，在校生65987人，教职员2516人；增建江西中学，使中学增加到4所。是年秋季，邕宁中学（邕高前身）开始招收高中新生两个班90人。这是解放后邕宁县高中教育的开端。

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党对教育的领导也不断加强。1955年春，邕宁县第一初级中学（邕高前身）建立邕宁县第一个学校中共支部组织，翌年，各中学亦相继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团（团委、总支）组织，开始在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学校的思想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

年，根据本县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我县规划了中学布局设点，增建了五塘中学、坛洛中学、大塘中学三所县办中学。1956年底，开始筹建邕宁县壮文学校。从四月份开始进行的公办教职工工资评级工作基本结束，由原“工资分制”改为“货币工资制”，教工的生活待遇比以往有所改善，教师队伍比较安定。

1950至1956年，本县人口较多的村坡都陆续建立了学校，边远山区分散的村坡也设立了教学点，因而广大群众子女都有了读书的机会。这七年，全县中小学共培养了小学毕业生15645人、初中毕业生1474人。他们除了一部分升学外，其余部分都回到农村劳动，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7年，全县各级学校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热潮，并认真落实省教育厅“教育行政会议”精神，确定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全年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按照上级的指示，全县中小学设立周会、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在初中三年级以及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知识课”。各校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提倡种菜、养猪、养鱼及其他一些生产劳动。积极发展幼儿、成人、壮文教育。壮文教育工作遍及城乡，声势浩大。分批举办基层人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2870人。创办干部、工农业余学校，高小班在校学员1600人，初中班1000多人。

同年下半年，各校进行党内整风运动，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在中学教师中开展“反右斗争”（小学教师则于次年开展“反右斗争”运动）。由于斗争扩大化，错伤了一些好人，造成了工作上的失误。

1958年，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各行各业掀起了“大跃进”的新高潮。各校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全县教育战线出现了“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即：“实行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的局面，形成了“大跃进”的势头。据年底统计，小学仍保持996所，但在校学生剧增，达到93739人，教职员2661人（含民办教师）；中学增设了蒲庙中学、南阳中学两所县办初中，全县中学增到95所（其中县办中学9所），在校学生12738人；增设初师一所，学员两个班100人；增设卫校一所，学员两个班100人。部分大队小学还附设农中班、耕读班（全县共计184所），在校学生12216人。各地还办起幼儿园1186所（含托儿所），在园儿童29394人，幼师1231人。全县有十多万成人参加文化夜校、工地临时学习班（组）学习汉、壮文。中学及部分小学兴办了校办工厂、农场、林场、养殖场，大力开展勤工俭学。部分社、队办的学校实行了半工（农）半读的教育制度。厂、矿、场、站、机关、学校等单位，还陆续举办了65所“农大”、“红专”之类的“大中专院校”。

邕宁教育事业的“大跃进”，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脱离了实际，加之当时在教师中开展“拔白旗”、“批白专”等活动，挫伤了干部、教师的积极性，从而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如在新成立的“大中专院校”，绝大多数名不副实，它们不到一年便不得不自行解散。

1959年，是我国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头一年，但在1958年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及中央庐山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邕宁县教育事业仍然保持继续“跃进”的势头。特别是成人扫盲、业余教育方面，表现更为突出。据年底统计，全县尚有青壮年汉文文盲、半文盲76000人；壮文文盲280000人。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扫盲教育任务，县委制订了1960至1965年的扫盲、业余教育规划，要求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基本扫除全县青壮年文盲；在壮族群众中，

扫除壮文文盲后，还要扫除汉文文盲。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普及业余初等教育，适当发展业余中等教育，有条件的地方还要创办业余高等教育。1961年还要组织75%以上的脱盲群众进入业余初等学校学习。

同年夏，在邕宁高中、蒲庙中学等校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对一些所谓“对三面红旗有不满情绪、言论”的干部、教师进行隔离审查、批斗。

1960年至1961年，邕宁县仍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因为缺粮少食，学校师生不得不以“瓜、菜、代”充饥，不少师生患有浮肿等病症。但在教学活动中，除了那些较大运动量的文体活动减免之外，其他活动照常进行。为了解决生活所需，大力动员师生（特别是中学师生）上山开荒大种薯类等作物，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努力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翌年县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区“宣传文教工作会议”精神后，总结了经验教训，才对原教育工作计划作了适当调整。同年，县委组织有关人员，就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情况作了检查，对过去无辜受害的干部、教师，按党政策的规定范围给予了适当的甄别处理。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好转和恢复，1963年，全县中小学开始执行教育部订颁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教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教四十条”），进一步纠正了学习苏联经验时脱离实际、“大跃进”时师生参加政治运动过多和劳动过多的错误做法，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教学应“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提倡小而精及启发式教学法；落实毛主席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从而，全县教育事业重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各级学校的教育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广泛深入开展，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多数师生都把“又红又专”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热情。在此期间，教育改革获得了很大进展，教育内部结构起了很大变化。据1966年4月份统计，全县已创办中等农业技术耕读学校两所（其中一所系附设），在校学生8个班350人，教职员43人。社办农业中学32所，学生74个班2857人，教职员127人。普通高中一所，学生12个班514人，教职员49人。普通初中9所，在校生5689人，教职员246人。公办全日制小学1065所，在校生1769个班68238人，教职员2400人。民办全日制小学324所，学生405个班12824人，教职员430人。扫盲等业余教育蓬勃发展。全县工农大众参加业余学校学习的达47353人。

这十年，邕宁教育事业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走了弯路，但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各校共培养了高、初中毕业生4092人，高小毕业生81473人。这期间，学校通过教育实践，积累了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初步经验；培养了大量人才，提高了全县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与此同时，我县建设了一支三千多人的教育工作者队伍。这支队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们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是办好我县教育事业的依靠力量。

1966年至1976年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下同）的十年。“文革”使党、国家的事业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林彪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首先从教育阵地地开刀。邕宁同全区、全国一样，教育成了重灾区，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

1966年6月后，邕宁各级学校相继掀起“文革”运动。不久，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在全县各中小学校中出现。“红卫兵”以“四大”为武器，“破四旧，立四新”，揪斗所谓“牛鬼蛇神”和“走资派”，致各级教育组织瘫痪，队伍分裂。十月份后，中学部分师生外出搞“革命大串联”，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少干部、教师受到了冲击。直至1968

年上半年，中学仍然停止招生。旧生（含66年毕业的学生）则留校协助学校搞所谓“斗、批、改”工作。1967年后，解放军“支左”人员进驻学校，进行“军训”；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动员各派群众组织搞“革命大联合”。

1968年下半年，邕宁各中学进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邕高、蒲中等校还同时进驻“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具体领导学校“斗、批、改”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此时，各中学的旧生全部毕业离校，并同时恢复招生工作。学校采取“个人自愿报名，群众评议推荐，领导审查批准”的办法招收新生，原则上毕业多少招多少。高、初中的学制改为两年（原各为三年）。采用区编或自编教材，仍然坚持“半天上课，半天搞运动”的作息制度。农村小学则由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简称“贫管会”）负责管理。此时极“左”思潮泛滥，党的教育方针被歪曲，正确的东西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枷锁“砸烂”。

1969年后，邕宁各中学相继成立“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校革委会”），各大队小学成立“学校革命领导小组”。它们在工宣队、贫管会的指导下，具体负责学校的“文革”工作和日常教学工作。此后，仍然贯彻“左”的一套错误做法，特别是实行“小学教师调回原籍小学任教”的做法，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1971年1月，县革委决定将蒲中、那楼、南阳、五塘、坛洛、江西、苏圩、大塘等八所县办中学以及原县办的蒲庙农业耕读技术学校下放给所在公社管理，同时明确提出“从今秋起，各社要办一所高中，一所‘五·七’劳校（将现有农中改建）”，做到“读小学不出村，读初中不出队，读高中不出公社。”8月中旬，“四人帮”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发地方各级政府。它抛出的“两个估计”，不仅否定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成就，而且给广大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等帽子，使广大教师又成了众矢之的，不少教师被批斗、被下放劳动，被迫接受“再教育”。年底，结合批林整风，又广泛开展了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及其“八大精神支柱”（即：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运动。一时搞得人心涣散，无心治学。

1972年，县党委加强对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继续组织广大师生学习、贯彻中央（1972）第4号文件，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据3月初统计，全县中小学共有学生50139人（次）、教职工7316人（次）参加了听讲、学习和批判会。各级教育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普及小学教育上，自下而上地制订了普及小学教育“四·五”规划，集中精力抓好基础教育。年底统计，全县开办学龄前儿童幼儿班140个，2674名儿童入园学习；95·4%的学龄儿童坚持上学，在校小学生达140000多人。同时，适当调整中学设点布局，基本完成了“每个公社（乡、镇）设一所县办中学”的任务。扫盲工作停止多年后又开始恢复。年底，已有40%左右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参加了扫盲班学习。勤工俭学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各校在保证70%以上的时间内搞好课堂教学外，还利用一定的时间组织师生开展学农、学工活动。全年勤工俭学收入达207138元，全县平均每生收入一元五角。

1973年至1976年，这四年间，在“四人帮”的肆虐下，邕宁县各级学校又相继掀起“批林批孔”、批“复辟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所谓“分清路线是非”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在此期间大力宣扬“黄帅精神”，查类似“马振抚事件”的事件，大批“师道尊严”；树立“交白卷”典型，批“智育节一”，鼓吹“无产阶级质量观”；提倡“学清华”，“赶朝农”和“教育学大寨”，把学生培养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闯将”。这期间，还实行农村中小学由农村生产大队来管办，城镇

中小学由工厂、大队来管办的制度。有的大队小学还实行了“农教轮换制”（即：农民和教师在规定时间内，互相调换工作岗位）。学校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总之，“文革”十年，是各行各业灾难深重的十年。一场浩劫，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各条战线的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严重地拖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当然，这十年间，特别是自1970年以后，由于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自觉抵制、排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邕宁教育仍有一定发展。据1976年底统计，全县公、民办小学共有1469所，学生140884人，教职员4689人（注：1966年上半年，小学1389所、学生81062人、教职员2830人）；县、社办普通中学32所，每所大队小学还办有附中班，在校中学生共52679人，教职员2546人；幼儿园1333处，在园幼儿44192人，幼师1735人；师范学校1所，学生两班80人，教职员16人。但是，当时多数学生受到“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影响，无心向学；多数教师受到冲击，部分教师受到迫害，心有余悸，影响了积极性；加之盲目发展中学（附中），师资数质两欠，大多数教师不胜任教学；此外，这时候没有实行招生考试制度，对新生没有一定的知识质量要求，起点很低，教育质量严重低下。大多数在学的中小学生均达不到相应的文化程度，甚至相当部分的小学毕业生仍处于半文盲状态。“中学的牌子，小学的底子”，这就是对当时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总结和评价。

1977年至1990年，在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期间的14年，是邕宁县教育事业拨乱反正、深化改革的十四年。

1977年至1978年，邕宁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通过揭批“四人帮”，提高了思想认识，“左”的影响得到了初步肃清，一些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被重新颠倒了过来。此期间我县初步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一些原来被“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一些被迫“离教”的教师也重拿起了“教鞭”。各校党、团组织正常开展活动，“红卫兵”组织被撤销。停了十年的学雷锋运动又得到了恢复。学校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积极进行教职工回收工作，并对全县中小学民办教师进行政治、文化、健康状况等考核工作。各中小学开始评选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调动了教师队伍的积极性。各校贯彻落实修改后的“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复办重点中小学和恢复大中专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和制订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办法，提出了各级学校教育工作者的具体职责、要求。中小学开始使用全国统编教材。县委制订了“扫盲规划”，要求于1980年以前实现“脱盲县”。邕宁教育工作结束了“文革”中的那种混乱状态。但此时中学超前、盲目发展的状况还未得到很好纠正；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也未得到改变；“以劳代学”偏向也未有得到认真克服。

1979年后，邕宁各级学校师生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揭批林彪、“四人帮”罪行，清除“左”的影响，彻底否定“文革”和“两个估计”，抛弃“两个凡是”，使平反冤假错案、“处遗”等工作得到顺利开展，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此时，学校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教学为主和抓教育质量上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逐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不断改革教学法，进一步加强德智体美劳的教育。“以劳代学”偏向逐步得到了纠正。各校积极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五爱”教育、纪律法制教育和劳动教育。学校加强目标管理，在广大师生中积极开展“学雷锋、创三好”、“五讲四美”等活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全县中小学校每年都涌现了一批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好”学生和

优秀学生干部。校风、校容明显好转。

遵照中央(1980)84号文件指示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精神,我县积极进行教育内部的改革,及时地撤销了“校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按干部“四化”方针要求配备中小学及乡镇教育组的领导干部,进一步调整中小学的设点布局,集中精力加强小学教育。我县还根据实际和可能条件,采取措施,努力做好“压缩高中,整顿初中,加强小学,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至1982年,调整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县高完中从1980年的12所,压缩为7所;县办初中从6所增到11所;另外,还将原来的社办高中11所全部改为初中,并增设3所初中,总计全县有14所社办初中。各高完中附设职业班,每校试办一班。大队附中从1980年的246处调整为104处;小学教点由1268个调整为935个。初步改变了“文革”期间教育内部结构单一,中学教育“虚肿”,小学教点过于分散不利于教学的不合理状况。尔后,经过继续调整,各级学校布局渐趋合理。到1985年,全县设有高中和教师进修学校各一所;1986年,还创办了职业高中一所;县城区增建完全中学一所,连蒲庙中学共2所;蒲庙镇中一所、完全小学3所、保育院一所;每个学区(2至5个乡镇为一个学区)设一所高完中;每个乡镇设一所县办初中及一所或一所以上的乡、镇办初中(含附中);每村都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完全小学。至1990年上半年,仅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县办普通中学就有19所,共249个班,在校学生13646人;职业高中1所,18个班,在校学生867人;小学(蒲庙二小,后称城关二小)1所,27个班,在校学生1333人;教师进修学校1所,6个班,在校学员307人。上述学校在职教职工共1178人,民办教师24人,代培教师50人,代课教师73人。1990年9月后,原蒲庙第一、三、四小学(后分别更名为城关第一、三、四小学)和蒲庙镇中(后更名为城关中学)等校,均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学校,中学由19所增至20所;小学由1所增到4所。1990年7月,还在县壮文学校创办民族中学1所,该校由县教育局管理,与壮文学校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据统计,1977年至1990年间,全县各中学除向农村、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部队等输送大量劳动人才外,还向上一级学校——大专院校输送1869名合格新生。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县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与1982年相比有如下变化: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161人上升为354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由6539人下降为5733人;初中文化程度的由16724人上升为20483人;小学文化程度的由44325人上升为51065人。1990年,全县文盲、半文盲(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称为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为62739人。与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比较,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由12.23%下降为7.56%。

自1979年以来,邕宁成人教育也有新的发展,各级业余学校遍布城乡,广大干部、工农大众学文化、学技术蔚然成风。1982年上半年,全县基本完成扫盲任务。1985年,基本完成了青年干部、职工的文化、技术业务补课任务。各乡(镇)村、街相继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业余技术学习班(培训班),积极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了劳动素质,扩大了致富门路。同时,成人教育还向更高层次发展。部分干部、职工、教师、社会知青等除积极参加县以上有关单位举办的各种函授班和培训班外,还积极参加电大、刊大等各种形式的成人专业班学习。1984年,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广西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和举行自学考试后,邕宁县考点每年都有不少干部、职工、教师和社会知青踊跃报名应试。1984年9月,我区首次举行自学考试,邕宁考点参试者就有130人。

自1979年以来,邕宁师资队伍经过考核、调整、充实、培训,素质有了很大提高;高、初中各科专任教师基本配套,具有合格学历的教师逐年增加。1987年起,在全县各级学校教师中,还

开展了评定职称工作，教师队伍更加稳定。

自1979年以来，县采取多渠道、多形式集资办学，使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自实行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后，各级政府的办学热情很高，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仅1989年一年，就筹集得1900多万元资金，基本完成了抢修中小学危房任务。到1990年，全县中小学基本实现“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十多年来，在县委的关怀下，每年还将筹集得来的部分资金有计划地扩建、新建了一批教学楼和宿舍楼，使部分学校的校容焕然一新。

上述事实说明，调整、改革的十四年（1977—1990年）是解放后邕宁县教育长足发展的十四年。但是，全县的教育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

第一，学校办学条件太差。大部分中、小学校舍仍然很简陋、紧缺。县办中学还有三分之一学校未有教学楼。不少学校虽有教学楼，但校舍不够用，不少学校无办公室、实验室和图书室。连重点中学——邕宁高中也未有图书室、实验楼。县教研室教职员40人，其中高级教师12人，因住房紧缺，有将近10户人仍住在危房中。教学实验仪器配套比例太低。有的村小无体育活动场地，课桌椅也不配套，教室采光差，影响学生身心健康。这些状况都很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教育经费缺口很大。全县教育经费，虽逐年有所增长，但由于学生人数剧增，教育规模扩大，加之物价上涨，因此，增加的经费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有的学校为了解决部分经费问题，采取多收学费的办法，致使学生的负担加重。

第三，师资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全县仍有约20%的中小学教师学历不合格（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仅为75%）。有的中学的一些课程专任教师不配套，其所缺专业教师，急待培养补充。

第四，学生厌学辍学现象有所发展。一些学生（特别是女生）厌学旷课，中途退学，致使学龄少儿做童工、童商、童农的数量有所增加。

附表一 明、清两代邕宁县进士、举人、五贡统计表

人数 / 类别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文	武	文	武	选贡	副贡	发贡	拔贡	优贡
明	代	7	1	261	15	8	2	276	/	/
清	代	23	10	181	200	61	31	355	54	8
合	计	30	11	442	215	69	33	631	54	8

注：表中数据系由县志办、各乡（镇）教育组提供。